HighLive | AER 运河上的起义：中国贸易可达性中断和社会冲突(1650-1911)

**原文标题：**Rebel on the Canal: Disrupted Trade Access and Social Conflict in China, 1650-1911

**推送摘要：**American Economic Review最新发表论文利用清政府废弃京杭大运河这一外生的政策冲击研究了贸易机会的丧失对社会动荡的影响

**原文链接：**

https://www.aeaweb.org/articles?id=10.1257/aer.20201283

贸易机会是增强还是破坏社会稳定，在经济学等社会科学中存在有争议的辩论。一方面贸易机会获得可能提高收入，促进就业进而稳定社会；另一方面可能因其提供巨大利益诱发社会动荡。关于这一争论的经验证据有限且结论不明确，仍需研究者提供可靠的因果实证检验。波士顿大学经济系曹一鸣博士与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陈硕教授合作撰写并即将发表在American Economic Review的论文“Rebel on the Canal: Disrupted Trade Access and Social Conflict in China, 1650-1911”利用清政府废弃京杭大运河这一外生政策冲击研究区域贸易机会丧失对社会动荡的影响。

京杭大运河作为世界上最大和最古老的人工水道，800年来为中国内陆航运提供便利、促进了周边市场繁荣。1820年运河周边地区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15%。然而，1826年清政府决定将粮食运输从运河转为东海。这项改革虽逐步实施，但最终导致运河完全关闭。该措施相当于剥夺了沿河地区进入运河通道的贸易机会，此后不久周边地区就发生了社会叛乱，为二者因果关系识别提供了研究契机。

根据清廷官方编纂的档案记录，作者构建了一个横跨262年（1650-1911）、覆盖575个县的原始数据集。研究设计方面，基准模型首先使用双重差分法（DID）检验沿河县（包括运河经过和直通运河的县，干预组）和非沿河县（远离运河的县，控制组）在运河废弃前后叛乱数量变化的差异。结果发现，以1826年（改革第一年）为分界点，政策实施前两地的叛乱数量没有显著差异，而政策出台后沿河县相较非沿河县的叛乱程度增加了126%。该结果在控制了混淆因素、替换成时变控制变量以及替代了模型设定之后仍是稳健的。随后，考虑到废弃运河是逐步完成的，作者用干预强度替代二元干预变量后进一步发现：一方面地理位置离运河更近或经济依赖河运更高的沿河县的社会动荡更严重；另一方面，由于市场准入减少，运河关闭的影响蔓延到附近非运河县，影响范围在距离运河150公里内。

上述结论可能受到的挑战是沿河县与非沿河县是否具有可比性。由于可能存在与运河相关的未知或不可观测的特征，会导致两地对其他某些共同冲击出现不同反应，作者采用了三种替代方法：第一，使用双重变换法（CIC）和合成控制法（SCM）估计，允许干预组和控制组间存在系统性差异，结果依然成立；第二，在其他可能与运河历史存在相似但没有废弃的贸易路线上并未发现安慰剂处置效应；第三，考虑19世纪在运河废弃时期的两个重要事件（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后，仍未发现其对运河废弃的影响出现估计偏差。针对运河废弃破坏社会稳定的潜在作用机制，作者给出的解释是：运河废弃是通过减少沿河地区的贸易机会，而非降低清廷军队镇压能力导致了社会动荡。

本文学术贡献有以下四点：第一，对长期存在的贸易机会获得增强还是破坏社会稳定的争议提供了直接可靠的因果证据。结果表明贸易机会丧失会破坏社会稳定。尤其在反贸易全球化当下，该结论强调了贸易路线对促进和平的重要性。第二，与以往研究只关注农村地区、天气或价格等短期冲击对社会稳定不同的是，本文聚焦在人口密集、经济繁荣的大运河沿岸城市地带。笔者发现在受到永久性贸易负面冲击后，国内冲突会急剧增加，之后会在较高水平上趋于均衡。这是因为贸易中断会导致城市工人更多失业。第三，丰富了交通基础设施作用的文献。相较现有研究更多关注公路和铁路的经济影响，本文是少数说明清洁和成本优势基础设施（大运河）的政治和社会影响的研究。第四，本文还揭示了运河废弃引发的社会动荡可能是19世纪中国华北地区的长期处于社会混乱的原因。